

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5.6006

数字化时代群众路线与民粹主义的话语辨析

陈杰¹, 江珊²

(1. 信阳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信阳 464000;
2. 信阳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 河南 信阳 464000)

摘 要: 互联网是亿万群众交流交融的共同话语场域, 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认知与价值观念。数字化时代群众路线与民粹主义的话语表征决定了两者之间在话语范式、话语特质、话语形式、话语目标和话语建构等方面有着“形似神异”的差异, 即两种话语体系在理论基点与基本内涵、主要特征与功能、言说方式与叙事框架、价值取向与实际效果、实践策略与路径等方面有着本质的不同。科学辨析群众路线与民粹主义之间的话语异同, 有利于厘清两者间的本质区别, 对进一步深化数字化时代群众路线理论与实践研究, 审慎应对民粹主义思潮冲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数字化时代; 群众路线; 民粹主义; 话语

中图分类号: G20; D2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5)06-0045-10

Discourse Analysis of Mass Line and Populism in the Digital Age

CHEN Jie¹, JIANG Shan²

(1. School of Marxism,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China;
2. School of Media,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net serves as a shared discourse arena wher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interact and integrate, exerting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people's ideological cognition and values. The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of the mass line and populism in the digital age determines that there are superficially similar but essentially differe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discourse systems in terms of their discourse paradigms, characteristics, forms, objectives and construction. Specifically, they differ fundamentally in their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basic connotations,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discourse modes and narrative frameworks, value orientations and practical effects, as well as practical strategies and pathways. A scientific analysis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discourse between the mass line and populism helps clarify their essential

收稿日期: 2025-07-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空间重构的机制与路径研究”(24CKS090);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话语创新的机理及路径研究”(2022BDJ017); 河南省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项目“教育数字化视域下师范类专业思政课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提升研究”(2025-JSJYZD-013); 河南省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项目“大别山精神赋能高校师范生理想信念教育研究”(2026-JSJYZD-014); 河南省教育系统廉政专题研究项目“高校二级学院防范和治理腐败难点及对策研究”(2024LZYB-17); 信阳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高校官微平台‘微语言’生态研究”(2025KYJJ127)

作者简介: 陈杰, 男, 河南新野人, 信阳师范大学副教授, 博士, 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

differences, which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further deepe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n the mass line in the digital age and prudently respond to the impact of populism.

Keywords: digital age; mass line; populism; discourse

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历程,本质上就是群众路线话语的建构与实践,一部党同人民群众“相濡以沫”的群众工作史。正是厚植在人民群众沃土中的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建构实践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话语体系,有效地实现了革命理论与人民群众的贯通融合,以此获得了持续发展的不竭源泉和强大动力。新时代,数字化已经成为推动各行各业转型、创新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互联网对网民群众的“求知途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会对他们对国家、对社会、对工作、对人生的看法产生重要影响”^[1],成了党同群众沟通交流的新平台,联系服务群众的新途径,发扬民主、接受监督的新渠道。然而,当群众和民意上了网,在释放数字化时代“草野”式网络民主的同时,也在虚拟与现实中催发了民粹主义话语的暴涨。所以,我们应理性地“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2]。实际上,数字化时代群众路线与民粹主义之间的话语交流交融交锋,往往徘徊在真理与谬误的“最后一公里”,把握适当、引导得法就是群众路线的话语实践;过犹不及、脱离实际就会深陷民粹主义的话语陷阱。两种“形似”而“神异”的话语体系,在话语范式、话语特质、话语形式、话语目标和话语建构等方面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我们有必要深入辨析数字化时代群众路线与民粹主义两种话语体系的异同,深化数字化时代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一、话语范式:两种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点和基本内涵

党的群众路线话语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处理政党与群众关系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话语典范,其

基本内涵包括党的领导、群众观点和领导方法三个要素。民粹主义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民和小生产者占大多数的国家及地区本身固有的一种具有历史复发性、变异性的社会政治现象,其思想系统缺乏完备清晰的理论范式,其话语实践通常体现为无政府主义话语、虚无主义话语和空想主义话语,令人捉摸不定,变化多端。

第一,党的群众路线话语是在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中国语境中的创造性转化。它不仅是一个历史观问题,也是一个实践观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贯穿和融入中国实际的认识和实践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推动者和创造者,且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者,其次是精神资料生产者,但这种生产和创造“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最终形成推动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合力,亦如毛泽东所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4][103]}这也为党的群众路线形成与发展提供了话语资源和理论基础。一旦进步完备的思想理论被人民群众认同、接受和运用,人民群众就会成为价值判断和实现的主体,就会运用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去不断创新、实践,推动人类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从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点讲,党的群众路线话语发轫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的原初话语。在国际共运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无产阶级政党都非常重视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批判旧的英雄史观基础上,确立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群众史观,并结合具体实际不断阐释了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理论与人民群众的基本关系,形成和丰富了关于群众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基本内涵,构建了马克思主义

群众观的基本话语框架。这些丰富的话语资源对于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语境进行创造性探索、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群众路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群众观点的原初话语融入中国实际,创造性地提炼出了中国特色的群众路线话语,实现了“一切为了群众”和“一切依靠群众”的话语融合,“从群众中来”和“到群众中去”的话语统一,因此成为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和根本的工作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群众路线的话语内涵又得到进一步深化拓展,党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史学习教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纪学习教育、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等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使群众路线话语更接地气、更有底气,各级政府探索创制的鲜活的“群众话语”层出不穷,如“最多跑一次”“一次不用跑”“只进一扇门”等政务服务模式。特别是数字化时代党群关系中的“微话语”,质朴、亲切、务实,充分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历史观与实践观、真理观和价值观统一融合的话语风格。其不断在实践中发展、丰富,形成了完备的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为协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支持,进一步佐证了任何时候“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够改变的”^[5]话语论断。

第二,在不同历史语境下,民粹主义话语的含义极度模糊,“除了一个大致认可的民粹主义名称之外,人们对于它的理解或者缺乏清晰一致的理论框架,或者仅仅是一幅由俄国、美国、拉美等地历史现象拼凑起来的非常破碎的画面”^[6]。事实上,民粹主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一定历史时期才会生成,很大程度上是对早期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所引起的社会危机的价值反思和理论重构,其力图绕过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造成的社会堕落与精神危机的陷阱,走向更加“乌托邦”式社会的一种探索。尽管民粹主义将“人民”作为核心政治话语,但是其所理解的“人民”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建构出来的虚假共同体^[7]。这是因为民粹主义话语在本质上就是大众对社会转型和社会变革的危机意识的具体体现。尽管其民粹主义话语内涵没有完备的思想定型,表现形

式也是复杂而多样,但如果将其置于特定语境和解释框架中,还是能找寻到某些大体一致的或基本的一般的知识、话语与思想、逻辑。

西方语境中的民粹主义话语,多是以美国民粹主义为话语范式,以美国的“人民党”运动为实践模式,以休伊·朗、乔治·华莱士和罗斯·佩罗为代表人物,研究者也多在美国的政治实践中观察、认知和解释民粹主义话语的基本内涵,包括概念、特征、内容、意义等话语元素。“作为代议制政治的反应和产物,民粹主义就像装饰的图案一样贯穿于美国的政治生活之中。”^[8]实际上,西方语境中的民粹主义话语割裂了精英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沦为掌权的资本权贵权力争夺、政治倾轧、抨击民主、掌控意识形态的话语工具。

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民粹主义话语,主要指作为马克思主义批判对象而存在的特定话语体系,“指19世纪上半叶在俄国平民知识分子中蔓延的、反映俄国农民利益和要求的社会思潮”^[9],代表着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农民社会主义话语,代表人物是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其后来演化、分裂成了革命派民粹主义话语和改革派民粹主义话语两类。其实质就是利用俄国的“落后优势”,以村社的社会主义形式跨越罪恶的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带有空想性质和无政府主义的“村社社会主义”话语性质。虽然,这种以村社理论为核心话语的民粹主义有过历史的进步意义,但随着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与工人运动实践的结合,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这种话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对象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阻碍。

改革开放后,受西方民粹主义话语影响、蛊惑,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民粹主义话语开始萌发,并借助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的传播载体和改革中突显的矛盾问题而“蓄势待发”。其打着民主的幌子不断在虚拟空间和现实社会中蔓延、膨胀,随心所欲地贴民粹标签,套用民粹模式,泛化民粹话语,宣扬“普世价值”,叙事体系中充斥着批评和批判改革政策、市场体制、知识权威、政府官员、共同富裕的话语,妄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也是我们当前必然要警惕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话语,其具有潜在的意识形态风险和社会危害。

二、话语特质：两种话语体系的主要特征与基本功能

党的群众路线话语具有为民、务实、清廉的话语特征,意在通过良好的党风、政风、作风、文风、话风,贯通党与群众的认知联系,赢得群众认同、信任和支持。民粹主义话语的爆发往往与社会中群体积压的不满情绪相关联。互联网的诞生,催生出了大量特色更为鲜明的网络民粹话语,其具有突出的草根性、非理性和抗争性等特点,意在表达和彰显底层人民群众的诉求和抗争。

第一,群众路线话语是党的根本性路线话语,具有为民的价值特征、务实的实践特征和清廉的自律特征,恪守与追求党、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共同价值及共享利益。为民立命、为民谋利,是党的群众路线本质的、一贯的价值追求,是做好一切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这里的“民”并不是民粹主义话语中抽象的底层“人民”,而是涉及各个民族阶级阶层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全体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等在具体历史实践中的“现实的个人”的集合。当前,恪守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是群众路线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提出的时代要求,“不是一般谈论加强或简单重复过去的做法,而首先是从我们面临的新情况出发,进行党的根本宗旨教育,使全党更好地树立‘为民’意识”^[10],努力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群众路线话语的为民理念,更在于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务实性实践行动。作为群众路线话语实践特征的务实性,就是强化群众路线的贯彻路径与方法,戒除当前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塑党风、提政风、转作风、改文风、清话风,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努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在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的群众工作实践中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群众路线话语的清廉性特征,既是党的群众路线为民、务实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群众路线实践的重要保障。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在做群众工作,贯彻群众路线时做到为民公正、依法执政、廉洁用权,自律于党的各项纪律,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营造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工作环境。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一个地方的工作,成在干部作风,败也在干部作风;一个地方的事业,兴在干部作风,衰也在干部作风^[11]。

数字化时代,网络空间已成为人民群众共同的精神家园、最具活力的话语场域,使得群众的观念和群众路线的实践语境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是互联网时代改变了社会存在的方式,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和当前社会的现实性不断交融。二是线下线上的结合催生了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变革,为实践群众路线增加了新空间、新平台、新途径,同时也带来了新挑战。那么,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赋能走好群众路线呢?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而且“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12]。

第二,民粹主义话语自诩是代表“人民”或“大众”的呼声。这里的“人民”是一个抽象同质、纯粹的数量性概念,其表面上具备团结性、排他性、平凡性的主体特征,而实质上并不具备具体的人民的个体意义。一般而言,民粹主义话语无论是标榜“以民为粹”,还是解释为“民之精粹”,其自身偏激和极端的秉性都会在理论或实践中割裂精英与大众的关系,最终使得平民主义、人民崇拜成为一种掩盖权力斗争的装饰品、操作工具或救世谎言。目前,学界有学者将民粹主义的特点概括为:三仇(仇官、仇富、仇专家)、两求(求民生、求民权)、两过(过均、过急)。总体上看,中国民粹主义话语呈现出平民性、非理性和抗争性的一般性话语特征,发挥着底层动员、政治追求和批判反抗的社会功能。

首先,起于底层,利于社会动员。民粹主义话语虽然概念模糊,但在具体实践中不仅明确区分了大众与精英,还对大众进行了划分,带着极端的平民化倾向。因此,以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为代表的草根阶层,自然而然成为了民粹主义话语实践的社会基础和力量源泉。如此,一旦动员了这些占绝大多数草根阶层的支持和认同,民粹主义话语和行动就具备了合法性,群众性暴动与革

命就成了改变现状的唯一选择。所以, 民粹主义也被描述为“下层人民的主义”。

其次, 超越理性, 追求简单化政治。群体永远不受理性影响。民粹主义话语与底层人民的联系、对大众力量的崇拜, 驱使着他们要唤醒这些“沉默的大多数”, 以“对抗统治阶层的践踏和掠夺”。这就需要民粹主义者以一种非常规的手段, 如利用最具民粹色彩的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 借助社会转型、社会危机、突发事件等特定条件, 依赖精神力量和道德感召, 在全社会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 形成一种非理性的集体行动逻辑和不假思索的群体路径选择。将这些复杂问题简单化后, “被唤醒”的大众认为, 任何复杂或技术化的政治设计在本质上都是违背大众意愿的, 他们更倾向于简单、透明、朴实、明晰、直接的政治民主体制。因此, 这种追求简单化的政治, 就成为民粹主义话语的政治风格和价值追求。

再次, 体制抗争, 充满批判精神与反抗意识。民粹主义话语造就的非理性大众, 心中充满对现行的体制、制度和权威的不满与怀疑。现代化进程中造成的客观性矛盾, 社会发展中蕴育的结构性冲突, 成为了民粹主义与现代制度之间抗争的根源。民粹主义的抗争话语是基于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基本政治态度而出现的, 自然充满着批判精神和反抗意识, 具有社会健康发展的晴雨表功能。客观上说, 谁也无法根除民粹主义话语与行动的出现和复发, 而正是这种批判和反抗的“种子”, 一旦遇到适合其繁殖和变异的“土壤”, 尤其是遭遇数字化时代的社会转型语境下出现的“新土壤”, 就极易“生根发芽”, 进而造成社会动荡。这也是我们要警惕民粹主义话语暴涨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话语形式: 两种话语体系的言说方式与叙事框架

党的群众路线话语是对党和群众基本关系制度性规训的规范表述, 借助“群众—党—群众”的叙事框架, 通过对党的先锋队、党的宗旨、党的先进性等核心话语的言说和表达, 群众路线被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民粹主义话语表现形式之一就是诉诸大众言论, 借助互联网平台, 利用数字化手段, 强占道德话语的制高点, 通过言论喧

嚣蛊惑和裹挟群众融入, 造成一种话语的强占与垄断的叙事逻辑, 以实现自身的诉求和抗争。

群众路线话语的逻辑结构蕴含了党与群众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论言说与实践理路, 即其中隐匿的逻辑主体和结构前提决定了如何引导群众认同党的先锋队, “要使群众认定我们党、我们的同志是他们的领袖, 并且自愿地跟随我们去进行决死的斗争, 这需要我们经过一个长期艰苦和正确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工程”^[13]。马克思主义认为, 历史是群众的事业, 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但群众及自发的革命热情, 如果缺少先进政党的觉悟启发, 是不可能完成革命使命和实现自身解放的。而定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 就自然地担当起了组织和领导群众的历史使命, 群众作为党组织和被党组织调动的客体而存在与认知。中国共产党先锋队话语的建构与言说不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还“极大增强了党的组织能量和活力”^[14], 增强了群众对其政权合理合法性的认同, 这恰如毛泽东所说: “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 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 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15]新时代, 群众路线在被注入新时代内涵的同时, 从认识层面上的“实践—认识—实践”的叙事理路, 到实践层面的“群众—领导—群众”的表述框架, 实现了服务和领导群众的历史转变, 但是群众路线话语的基本言说方式和叙事理路实质仍被传承和发展。

相对于传统群众路线而言, 数字化时代群众路线的实践主体、工作对象、运行载体、言说方式、叙事理路、工作环境等发生了重要变化, “互联网越来越成为人们学习、工作、生活的新空间, 越来越成为获取公共服务的新平台”^[16], 也影响和促使着群众路线话语体系的言说方式与表述理论随之发生适应性变化。毋庸置疑, “人工智能+”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业态、网上群众路线话语实践的新形态。那么, 如何借助数字化技术对群众路线话语进行有效言说与逻辑叙述? 所谓有效言说, 就需要创造适应网民口味和虚拟空间的“新话语”, 真正构建群众路线话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 向数字化时代党群互动的认识结构、手段方法、功能价值、实践举措转换, 以带动网上群众路线叙述框架的逻辑转换。进行逻辑叙述,

需要具备适应网民思维和虚拟空间的“新思维”，真正实现群众路线话语机制运行的逆向参与双向互动，实现群众范畴中的线上群众向线上线下的所有群众全覆盖，虚拟空间的务虚引导向现实社会的务实工作转变，党群互动的客体性向主体性的逻辑转换，以营造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的数字化群众工作语境，把党的理论政策变为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

民粹主义话语借助于数字化时代的新语境实现了话语嬗变，形成了独特的网络民粹主义话语体系。平民视角、草根定位、游戏心态、狂欢式躁动、群体极化的话语表达，催生了其话语体系的言说方式和叙事逻辑，使之不断在虚拟空间和现实社会互动中蔓延、泛化和变异，成为威胁社会安全与和谐的一种危险的话语表征。任何学说理论、话语体系都是一定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产物^[17]。数字化时代，民粹主义话语之所以能在虚拟空间大受欢迎，除了具备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技术等方面的“土壤”滋生和技术催化以外，还得益于民粹主义话语建构的言说方式与叙述逻辑。对于网络民粹主义话语的言说框架而言，首先，强调话语的平民性或草根性，使其具有批判知识、权力和财富的天然合理性。其次，强调话语细节和暗示，进行情绪持续酝酿和叠加发酵，以裹挟更多群众形成所谓的“民意”潮流。再者，结合社会背景对事件或人物身份贴标签，制造舆论话语的对立和冲突。最后，动员网民群起而攻之，迅速强占或垄断话语霸权，再伺机蔓延到整个政治生态环境。对社会的不满情绪，都被民粹主义者极为巧妙地转换成网络群众代表“人民”话语进行言说，并无形中形成了渗透到“人民”日常生活中的话语表达，从而“成功”地实现了对公权力和社会秩序的影响渗透。

民粹主义话语言说框架逻辑的合理性还在于其善于进行话语伪装。借助群体性的“人民”之光，民粹主义者始终站在神圣化的“人民”的立场和圣洁善良的道德制高点，对社会上出现的公共事件和热点敏感话题，“通过建构一种话语表述，形成表述框架，提供明确的观点、立场或立场的倾向性，以引发认同，造成不是真相胜似真相的效果，以引导舆论走向，实施话语表述的控制”^[18]。当然，民粹主义不仅对自身进行话语包装，更善

于将民粹主义话语因子包裹进其他主义里面，形成一些民粹主义的变异话语，如包裹着爱国主义话语色彩的民族民粹主义，带有网络民主话语成分的网络民粹主义，盲目反对权威与垄断的文化民粹主义等等。总之，在数字化时代催生的这个独一无二的虚拟与现实交织空间中，与一般的网络舆论话语表达模式不同，网络民粹主义话语体系已经构建了一套适合数字化生态的模式化言说套路或叙事模式，如网络话语渲染、情感话语叙事、身份话语审判、暴力话语强占、道德话语公审等叙事流程，从而达到“议题设置—话语强占—社会动员—大众审判—底层抗争”的叙事目的。所以说，“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网络民粹主义的内涵天然地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性，并在发酵过程中对网络空间内的舆论环境产生持续性影响”^[19]。

四、话语目标：两种话语体系的价值取向与实践效果

党的群众路线话语，贯穿其始终的价值取向就是以人民为中心，服务于人民，为人民谋利益。其内容上表征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基本内涵，理论上在坚持群众路线基础上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宗旨上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目的，方法上注重依靠群众与教育群众相结合，实践上恪守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价值统一。民粹主义话语坚持以抽象的人民大众为崇拜和信仰的主体，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理想和实践利益，并在实践中把农民和一般劳动者平民化、理想化、大众化，鄙薄知识、妄议道德、质疑权威、反对体制，妄图达到避开资本主义“漩涡”而进入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理想社会，具有双重性的社会实践效果。

群众路线话语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维护群众根本利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价值话语，是做好党的一切工作，提升群众工作科学化水平的实践话语。任何时候，“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4]857}，正因为共产党人时时刻刻不脱离群众实际，总是“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4]1096}，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才使得我们党无论在任何艰难险阻中总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

和支持,不断引领着人民群众从胜利走向胜利。这也正是党的群众路线话语体系的实践价值所在。

第一,创造性地为处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奠定了价值范式和实践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具体体现的群众路线话语的价值范式和实践标准,始终贯穿于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始终体现在“为民立命、为民谋利”的话语实践中。党群关系问题是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一个没有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的政党根本无法生存,更遑论维护政权,实现人民群众的自我解放。政党与群众犹如鱼与水、血与肉、种子与土地,如果执政党脱离了人民群众就会“根基不牢”,执政地位就会“地动山摇”。党的群众路线话语不仅创造性地形塑了反映人民群众需求、意志和行动,与党的正确主张、社会发展规律高度一致性的价值范式、实践标准的话语模式,而且实现了“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20]的话语转换。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性话语特征,也决定了数字化时代变化的语境中更应注重群众工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更应加强“人工智能+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与网上群众路线实践。

第二,常态化地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规定了话语规范和制度标准。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和内在禀赋,始终贯穿和体现于党的性质、宗旨、任务和党组织及每个党员的全部工作实践中。党的群众路线话语在新常态化语境中,强化和催生了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升的根本方法、有效途径和标准规范。新时代,这也要求更加注重“人工智能+群众工作”的融合与互动发展,“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上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检验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试金石,进一步建立健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长效机制,在时时处处为群众排忧解难、造福人民的实践中具体地体现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21]。

第三,持续性地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供智力支持和不竭动力。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进程中,是否坚持群众立场、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是否依靠群众力量、群众智慧去维护和发展群众利益,是否

共建共享改革开放成果,成为了衡量党和国家一切工作和路线方针、反映人民群众利益和愿望的根本尺度,更是巩固党作为坚强领导核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人心与力量,协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根本保障。

民粹主义与数字化融合生成的网络民粹主义话语,在“网络民主”时代大行其道,自视为代表底层“人民”的民意所指,视政府官员、富人阶层和知识权威为“敌人”,以理想化、平民化的道德话语追求过均平等和过急速度,但始终缺乏明确的核心价值。实质上,这种极端的、非理性的民粹主义话语根本不可能代表现实中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现实诉求,且与公平正义更无根本瓜葛,更谈不上实现“共同享有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22]。目前,“数字技术不仅从外部为民粹主义的滋生创造了有利环境”,还“从内部驱动了民粹主义的崛起”^[23],任由这种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怪现象和各类蛊惑人心的标签话语泛滥下去,其结果只会蓄积和蔓延更大的社会不良情绪,还可能成为一股网络空间的躁动激流,以致发展为从话语符号、群体情绪到现实暴烈行动的话语转换,滋生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民粹主义话语价值具有双面性。在仍具民粹主义话语生发土壤和潜藏空间的数字化时代,科学认识民粹主义话语体系,就应正视和利用好民粹主义话语的积极作用、正面价值。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的转变,各类社会转型、改革中的深层次复杂矛盾、社会问题、利益诉求日渐突显,民粹主义话语中对涉及国计民生的种种问题的关注,预警了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容纳限度,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社会危机的爆发、缓解社会矛盾的激化,具有一定的彰显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合理价值。同时,我们对民粹主义话语的消极性负面价值也必须高度警惕。这种带有平民性、批判性、理想性的情绪话语,会在特定条件下激荡大众心理,且极易与其他思潮相融合而形成变异形态,进而削弱社会理性发展的自发机制,或可成为威胁社会和谐与稳定的一种破坏性、极端性的话语和政治宣泄。简言之,民粹主义话语实践作为一种社

会思潮,民粹主义强调平民的价值和理想,反对精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民粹主义主张依靠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把普通群众当作政治改革的唯一决定性力量;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其指的是动员平民大众参与政治进程的方式,强调诸如平民的统一、全民公决、人民的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从而对平民大众整体上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操纵^[24]。

五、话语建构:两种话语体系的实践策略与路径

党的群众路线话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独特的政治优势、政治资源,融入了历史观与价值观、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辩证思维,成为贯穿于党的全部理论与实践的一种决策模式。民粹主义话语借助互联网而喧嚣和蔓延成为一种思潮,循袭着“符号—行动”的话语表意路径,借助“话语生成—话语传播—话语实践—话语建构”的叙事策略,形成了对线上线下的实践行动与叙事对象的话语能指,“具有极强的向现实行动转化的意义潜能”^[25]。

群众路线话语策略在于沟通协调党与社会大众关系,借助民主的制度与程序解决其实践困境,避免和消解疏离大众的精英化群众观与反智主义的民粹化群众观的异化形式,实现新的历史条件下群众力量、群众智慧和群众利益的整合,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群众路线的实践话语在很大程度上要对群众工作中呈现的这一个问题作出回应,进而在日新月异的数字化时代提出有效的因应策略与建构路径。实质上,群众路线与民主政治有着契合相通的话语本质,即群众路线实践中,党需要倾听群众的意见,尊重群众的意愿、诉求和利益,以修正、激励党在执政和决策中的合法性与有效性,防止党在执政环境下脱离群众。同时,在民主政治的话语框架内,群众的冲动和激情又需要得到理性的抑制和约束,不能任其放纵泛滥,这就需要党给予理性的引导,依赖二者之间的尊重、信任和协商,使党的决策更合理、群众行动更理性。但是,党与社会大众之间又存在共存、竞争和制衡的关系,无论偏向哪一方都会影响群众路线话语的实践建构,而民主的制度与程序恰能在转型的中国语境下,很好

地平衡党与社会大众的关系,二者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从而可以有效地“提升政治精英与大众之间政治沟通的制度化水平,减少群众路线实践中政治沟通的‘运动’性质”^[26]。

毫无疑问,数字化已经成了新时代做好群众工作的新手段,实现党与群众之间良性互动、融合发展的新场域。对现实社会而言,从解决影响和制约群众根本利益的矛盾问题入手,在社会转型与深化改革的场域中走好群众路线,需要以创新策略和具体路径推动群众路线的发展和实践,如涉及群众教育、就业创业及社会保障的民生工程,涉及群众公平正义及公共服务的民主协商机制,涉及群众路线实践的保障机制和涉及党的领导方法、群众工作能力等方面的思想政治建设等等。相比之下,虚拟空间就是现实社会的延伸。走好网上群众路线,除了坚持传统群众路线的核心价值外,就是要学会利用数字化赋能宣传群众、联系群众、组织群众和服务群众。这是数字化时代群众路线话语实践的一个重要思路,关键在于强化党与大众之间的密切联系、互动融合的主体责任与内在动力机制,实现政党与社会、新媒体的民主监督和制度约束的互动循环,具体措施如提高领导干部的数字素养与工作能力、健全网上群众路线的工作机制等。同时,数字化时代群众路线话语实践也坚决反对和抵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等一系列违背群众意愿、损害群众利益的“负能量话语”充斥虚拟和现实的空间。

民粹主义话语秉承“符号—行动”二元思维模式,经过互联网“发酵”已经形成可以复制的话语套路和话语策略,即每有特定事件发生,其自身完备的语言结构、叙事理路、传播策略、行动框架就会被自动“激活”,借助事件、情感、身份、阶层、贫富、道德等标签性语言,强占社会空间的话语霸权,引发“群体极化”现象。虽然民粹主义缺乏明晰概念和系统思想,但其话语建构并不是不讲策略,不设路径。网络民粹主义正是基于话语建构的策略与路径,迅速在虚拟空间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意义转化”场域,还潜在地影响和带动着现实社会的话语转换与互动融合,实现对任何反对话语或声音的干扰与压制,从而导致大众认知、意义认同和行为操控的群体性、符号性的社会心理学思维与暴力行为爆发。因此,

我们要特别警惕那些打着“爱国”“为人民”旗号的民粹化现象。

第一,借助网络事件话语大肆渲染,构置议题。数字化时代的互联网被认为是极具民粹化倾向的场域之一。近年来,一些被网络曝光的官员腐败、生态恶化、学术不端、道德败坏等公共事件被民粹主义者充分利用、强劲发酵和大肆渲染,并借助网络言论修饰、制造、传播谣言,臆造、演绎细节,或者采用道德先判、利益暗示等话语套路,迅速抢占和设置网络议题,达到吸睛、号召和动员大众的目的。

第二,使用悲悯情感的话语进行底层动员,赢得认同。情感动员话语“所依赖的是能够激发网民的嬉笑怒骂、喜怒哀乐等情感的表现形式和内容”^[27],“以悲情叙事、激起愤怒、戏谑抗争等技术形式为主的情感动员策略,旨在引发网民的情感共鸣”^[28],持续不断地激发原子个体情感,整合、发酵群体情绪,以群起的“众势”攻击占据统治的“权势”,促成既定意义生成的群体认同话语与实践行为,如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中网络流传的“高铁体”造句就是典型例子。

第三,利用敏感身份话语区分敌我,抢占道德制高点。贴身份话语标签,喊政治口号话语,以突显身份、地位、权力、财富和阶层的不平等,进而理所当然地简单划分“人民”与“敌人”的身份和阵营。这是民粹主义话语建构的惯用伎俩。从虚拟空间到现实社会,类似的官二代、富二代、垄二代、商二代、星二代、学二代等既得利益群体代表者,其“敏感身份”往往被网民视为“痛恨”的对象,常常会形成网民仇官、仇富、仇专家的思维逻辑,并条件性地对其进行“有罪推论”。

第四,不惜恶搞暴力话语批判强占,表达诉求和抗争。恶搞话语、暴力话语,甚至人身攻击、人肉搜索,是网络民粹主义实施话语强占过程中贴标签、扣帽子、晒身份、散谣言、妄谩骂、乱攻击、压声音等手段的升级版,力图将事态闹得越大越好。其策略在于套用潜在的话语模式和叙事框架,引导狂欢式的大众实现从虚拟向现实的话语转换,实现网络场域构建和话语独占,试图从线上走到线下,促使运动群众走向极具破坏性的群众式运动。

党的群众路线话语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表述,是中国共产党本质属性、根本宗旨、坚定立场和工作方法的中国化表达,也是与其他政党话语体系区分的中国共产党话语特质之一。在数字化时代,网络民粹主义话语“借助了信息技术和传播媒介而开展行动”^[29],呈现了与群众路线看似相同或相似的话语表征,尤其在重视和回应人民群众利益诉求方面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我们不能由此认为民粹主义就是群众路线的“同义语”,这样就会在本质上异化群众路线话语体系,其结果是要么盲信群众,要么脱离群众,进而在实践中曲解大众与精英的关系,割裂党与群众的联系,导致极为严重的政治后果。事实上,民粹主义话语正是“在这种政党与社会的疏离中得到了机会”^[30],极端强调从平民大众的价值诉求、道德情绪、实际利益等出发,过分注重大众意愿和平民情绪的满足与顺从,以“人民”的旗号否定精英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热衷于诉诸暴力与革命,进而实现对全部群众的话语操控。这种话语极易造成网民群众情感上迷茫、思想上迷失、价值上迷惑的态势,导致其在实践中误入歧途。概而言之,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只有坚持科学、正确、发展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公正客观地对数字化时代的“民粹思潮适度控制,防止偏激,防止被利用”^[31],通过改革与发展的方式根除民粹主义土壤,才可以有效疏解网络民粹主义话语对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话语实践,对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种种纷扰。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69.
- [2]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34-35.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669.
- [4]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5]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2卷[M]. 2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266.
- [6] 林红. 民粹主义: 概念、理论与实证[M]. 北京: 中央

- 编译出版社, 2007: 1.
- [7] 赵丁琪. 民粹主义的话语本质与社会基础[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3(7): 139-148.
- [8] 保罗·塔格特. 民粹主义[M]. 袁明旭,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33.
- [9] 汪亭友. 对“民粹主义”问题的一些看法: 三种语境的不同解读[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16, 1(2): 88.
- [10] 李君如. 坚持群众路线的时代要求: 为民务实清廉[J]. 唯实(现代管理), 2013(8): 4-5.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论群众路线: 重要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3: 126.
- [12]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472.
- [13] 刘少奇. 刘少奇选集: 上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59.
- [14] 杨成虎. 群众路线的逻辑、意义与限度[J]. 云南社会科学, 2011(4): 15.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 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307.
- [16]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191.
- [17] 汪亭友, 吴深林. 美西方语境语义中的“民粹主义”及其马克思主义分析[J]. 政治学研究, 2024(3): 36-49, 241-242.
- [18] 陈龙. 话语强占: 网络民粹主义的传播实践[J]. 国际新闻界, 2011, 33(10): 16.
- [19] 刘娜, 刘佳. 表征·演绎·消解: 网络民粹主义的透视与审思[J]. 领导科学, 2024(3): 80.
-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409.
- [21] 习近平在全国创先争优理论研讨会上强调 认真总结和运用创先争优活动经验 切实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N]. 人民日报, 2012-05-22(1).
- [22] 习近平. 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22.
- [23] 杨春林. 数字时代西方民粹主义崛起的技术动因[J]. 国外理论动态, 2024(2): 154.
- [24] 俞可平. 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J]. 战略与管理, 1997(1): 88-96.
- [25] 冯月季. 从文本到行动: 网络民粹主义的符号学阐释[J]. 当代传播, 2016(6): 30.
- [26] 殷冬水. 群众路线: 中国国家治理的一种实践形式: 当代中国群众路线两种观念的实践困境与应对路径[J]. 南京社会科学, 2014(5): 59.
- [27] 杨国斌. 悲情与戏谑: 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J]. 传播与社会学刊, 2009(9): 39.
- [28] 陈相雨, 张卫. 网络集群行为动员: 场域、策略及其风险[J]. 江海学刊, 2016(6): 230.
- [29] 刘力波, 赵潜. 网络民粹主义的产生、危害及应对策略研究[J]. 理论学刊, 2022(5): 93.
- [30] 林红. 在社会与国家之间: 欧洲政党政治中的民粹主义变量[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24(6): 77.
- [31] 陶文昭. 中国民粹主义新特点: “三仇”、“两求”与“两过”[J]. 人民论坛, 2016(13): 33.

责任编辑: 陈璐